

记忆与历史:中共纪念史研究的新视野^{*}

凌承纬

[摘要]推进中共历史学体系的学术化、科学化进程,必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中共纪念史研究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中共纪念史研究体现了中共党史研究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加强记忆史研究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建构,将有助于拓展中共纪念史研究学术实践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 中共纪念史; 历史记忆;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8(2018)06-0024-08

“纪念”一词是用来表现、记忆和复原一个社群主要历史事件的一个专用术语,其中“记忆”是纪念的一种主要形式。记忆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为历史行动者提供了他们赖以理解实在的符号手段,从而在塑造社会过程的时候扮演了积极角色”^①。人们为了记忆而纪念,而某种纪念通过节日仪式增强了记忆的功能,节日、纪念、记忆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历史载体,这种历史载体提醒人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现代政治生活中的纪念活动延续了这一传统,借助仪式化、定时化的纪念活动来延续历史记忆,纪念活动在塑造群体记忆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共历史上,曾经举行过形式多样的各种纪念活动,订立了各种纪念节日,以期通过纪念活动,唤起党的组织成员以及社会民众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显然,中共纪念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过程,是中共历史这一巨大结构体中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中共历史发展的面相。因此,从历史记忆的视角对中共纪念活动这一史事存在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变迁进行整体研究,将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拓展新的研究空间。

一、记忆理论的兴起

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历史观念的转变,国外史学界在研究主题上出现了“文化转向”,新文化史研究由此应运而生。记忆史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②,“记忆”因其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而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冠以“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的记忆研究也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学术思潮的推动下,历史研究也呈现出“记忆的转向”,并且成为这个时代史学建构的一个标志性现象^③。其实,作为一种人文学科思潮,西方的记忆研究理论从起源到兴盛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对于“记忆”的研究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

* 本文是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44)子课题的阶段成果。

① [西]米格尔·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② 彼得·伯克认为,充满新意但却异常繁多的新文化史研究主题可以被概括为七大类别,分别是: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和行为社会史。参见[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李宏图校,《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③ 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这部被他自己称为“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作品”中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其展开研究。在此之前,记忆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单个的个体记忆,研究的范围也只是局限于心理学的领域。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将“记忆”从生物学的层面剥离出来,“记忆”不再仅仅被视为是“个体官能”,而是在人与人互动和交往中所产生的社会产物。然而,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关于集体记忆的论述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关注的仅仅是“记忆”对某一具体团体的意义,而没有将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扩展到文化范畴中去。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重启关于记忆的研究,“记忆之场”、“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一系列基本概念被相继提出,“记忆”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内都兴起了记忆研究。

记忆研究理论在2000年前后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相关学术实践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下蓬勃展开。在翻译出版了一批记忆理论研究的重要著述之后,“集体记忆”、“记忆之场”、“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记忆理论的核心概念逐渐被运用于考察社会群体的记忆如何建构和维系^①、国家权力如何塑造社会记忆^②、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如何改造和重构记忆^③等问题当中,有学者将上述研究视角归纳为“国家权力”、“社会群体”和“历史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中国记忆研究的“国家在场”、“底层立场与社会关怀”和“体制约束”的特点^④。

尽管近年来记忆理论逐渐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各门人文社会学科都加强了各自领域的记忆理论问题研究,但是在记忆研究的学理层面上,将记忆理论与中共党史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学术实践尚且少见。社会性的记忆,总是通过纪念的方式围绕着一些重大事件而展开,中共的纪念活动反映的不仅是这种社会性的历史记忆,而且反映的是政治性的论述记忆,将记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共纪念史的研究实践中,不仅能够扩大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形成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更有效地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

二、记忆理论与中共纪念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纪念活动作为历史对象被逐渐纳入党史研究的领域,并取得了颇丰的学术成果,相关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回忆性、宣教式、策论型的窠臼,逐步迈入学术化、科学化的进程。近年来,随着纪念活动在中共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中共形象的建构、塑造重要作用以及对社会凝聚和

① “知青”记忆研究是社会群体认同记忆研究的热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

② 在学术界,对土改“大生产等运动中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并确保社会群体对新政权的认同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③ 从历史变迁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记忆,体现了记忆研究与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社会体制深刻变化的紧密联系,持这一视角的研究者大多跨界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见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高蕊《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社会》2015年第3期;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正是由于记忆研究理论逐渐被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使得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分析。

④ 参见钱力成、张翩翩《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社会整合功能意义的凸显,中共纪念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①。纵观已有的中共纪念史研究,主要着力于考察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演进,纪念活动的类型、方式、特征、内涵、功能、价值以及对中共纪念活动的评价等方面的问题。有学者在相关学术史综述中,概括了目前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热点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集中对重大纪念活动本身的研究;其二,对纪念活动在推进中共理论创新、自身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所发挥的政治功效的深层解读;其三,围绕着纪念活动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中共纪念史定义为“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历史场景的再塑,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缘由、方式、功能、规模、价值的考查,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评价”^②。中共纪念史研究扩充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已越来越得到党史学界的认同。然而,随着学术实践的深入和细化,既有的研究路径所存在的重视实证研究而缺乏理论建构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第一,当前中共纪念史研究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多着力于对单个纪念活动本身的研究。纵观目前中共纪念史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大都是以单独的纪念事件为主,诸如“七一”、“十一”、“五一”、“五四”、抗战胜利日、马克思诞辰(逝世)纪念日、列宁诞辰(逝世)纪念日、孙中山诞辰(逝世)纪念日等中共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日即是。这些研究对象的选择,显然不同于过往那种宏大通论选题的研究,更倾向于以个别性历史单元为研究对象。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兴起,本身就是对过往“抽象化”宏观研究和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矫正,将问题意识落脚到中观或微观的历史层面上来。这种研究观念的初衷,是希冀以单个的纪念活动研究来勾勒中共纪念活动历史的整体性图景。但是,囿于个案研究的技术性结构,使得研究的最终结果,往往集中在对单个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具体形式、历史进程的梳理、考证,并没有能够以超越个案本身的解释框架完成“以小见大”的思想预设。由于个案的自足性和特殊性,单纯停留在个案层面的中共纪念史研究并不必然能够深化对中共整体历史的认知。因此,如何正确处理纪念史个案单元研究与中共整体性历史研究的关系,在理论与方法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中共纪念史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的微观化,还缺乏恰当的研究方法可匹配,相当部分的中共纪念史研究,还仅停留于利用相关史料进行简单事实叙述的实证研究。这种试图追求对个别事实的“还原”,既存在缺乏探讨史料被选择、描述、建构的可靠性依据,也存在缺乏探索史事背后的社会和语境因素的思想自觉。历史事实诚然是历史研究者的永恒追求,但这些文本史料记载的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并且“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③。因此,单纯考证和梳理史料表面所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并不能体现纪念活动是如何“还原”历史记忆,如何激活历史记忆的社会功能,以及验证纪念活动如何延续历史记忆的意义与价值。所有这些,都可能限制中共纪念史研究学术视野的扩展。

^① 自2000年至2017年,《中共党史研究》先后刊载了陈金龙《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2007年第6期)、胡国胜《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2009年第5期)、童小彪《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以党报党刊为中心的历史考察》(2010年第7期)等十余篇中共纪念史的研究文章,《党的文献》先后刊载了张海鹏《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2001年第5期)、梁化奎《首次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揭析》(2011年第4期)、孙业礼《“纪念”是篇大文章》(2012年第1期)、贺永泰《中国共产党对“七七”抗战的纪念——基于六篇抗战周年纪念宣言的分析》(2017年第4期)共4篇相关文章,《当代中国史研究》刊载了张海鹏《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2001年第6期)、郭若平《塑造新思想: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2009年第3期)两篇有关中共纪念史的研究文章,《党史研究与教学》刊载了吴志军《一九五一:建党30周年“文本纪念”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以对中共党史的宣传为叙述中心》(2008年第3期)、朱斌《论中共纪念辛亥革命话语之嬗变》(2011年第5期)、胡国胜《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2012年第3期)等十余篇相关文章。除了上述党史国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外,在其他综合性的学术期刊上也陆续刊载了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章。

^② 魏建克《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研究:一个文献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③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第三,意义诠释路径的单一性。这是一些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的存在通病,尤其在以剖析中共纪念活动历史内涵、功能和价值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大多从各种纪念活动的缘由、类型、形式、功能、规模等方面来剖析纪念的内涵,从分析纪念活动与中共关系的角度来考查纪念活动的价值,这种局限在史事现象层面上的叙述框架略显陈旧,缺乏深度的意义解释和话语建构,使得研究的结论显得既宽泛又浅陋。因此,若是一味执着于缺乏建构性分析的实证,则难以有效分析纪念活动背后的历史动力以及与政治、社会的历史关联。强化意义阐释中的问题意识,是提升中共纪念史研究学术水平的必要手段。

中共纪念史研究中存在的这些现象,导致中共纪念史研究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研究成果总是停留在重复叙事的低水平状态,同类型的问题往往无差别地被不断研究,却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共纪念史研究要走出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必须重视理论的建构和方法的更新。中共纪念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研究邂逅的产物,而记忆史这种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正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研究方式。因此,将记忆史研究与中共纪念史研究结合起来,将有助于中共纪念史研究建构起以历史记忆为核心的研究范式。

任何纪念的功能之一都是强化记忆,约定俗成的纪念仪式正是“为了能够回忆起共同历史的诸起伏波折”,“进一步增援强化的记忆化”^①。记忆既是个体生物性的体现,同时又与人所生存其间的社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结,受到社会结构、社会处境与价值认同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记忆研究通过解读以语言、文字、图像、实物以及人的身体和行为等为媒介所表述的人类记忆状态,由此得以深入了解留在这些记忆中的个体、群体及其所在时代的情境。记忆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演变体现了集体记忆得失的重要性。集体记忆将历史像科学和公共礼仪一样加以对待,丰富的档案和文献(纪念性的)是处在上游的历史水库(动态的),而在下游,则是历史研究发出的响亮的回声(鲜活的),集体记忆成为了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主流阶层与非主流阶层为权力、生活、生存、发展而激烈争夺的一部分”^②。因此,如何保存、延续和利用记忆成为一个政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真正的群体是一个记忆的群体”,中共的纪念活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强化群体认同与相关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来“复述自己的故事和叙事方式”,赋予政党组织成员的去、政党经历的历史以重要的现实意义^③。

记忆承载了象征化的历史现实,现实因记忆的存在而具有了历史感,由此,历史记忆应当研究历史现象是如何地传承集体记忆,如何地以记忆来建构“过去”,如何地从对“过去”的记忆中来解读“当代”。中共纪念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式,根据研究对象和记忆史研究的特点,可以将记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转借并运用于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术实践中^④,以增强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含量。记忆史研究与历史想象、社会建构、国家权力和身份认同等问题都具有相关性,因此,记忆史视角的介入,将改变中共纪念活动史的具体过程再叙述和再建构的研究理路,发掘隐藏在纪念活动表层下政治记忆的功能和意义。

① [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页。

② [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③ [美]杰弗瑞·奥里克、乔伊斯·罗宾斯《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周云水编译,《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

④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者关注到了党史研究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可以参照记忆史的方法对中共历史记忆的形成、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研究。相关论述参见郭辉、罗福惠《“中共记忆史”研究的提出及构想》,《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三、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多重记忆窗口

记忆史与纪念史并不是同一种历史现象,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研究纪念史,不能不研究纪念是如何强化或延伸记忆的历史感,而研究记忆史,同样不能不研究记忆是如何为纪念提供历史素材,双方互为支撑研究的学理基础。中共纪念史研究以记忆史作为切入点,可以使这种研究的任何相关选题具有新颖的观察尺度,它不再需要仅仅以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宏大发展为主要基调,而是以关注社会实在与观念意识之间的关联为思考对象,强调对研究对象的思想描述和意义阐释。由于记忆的存在方式具有多样性,那么,合理运用记忆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将打开中共纪念史学术实践的多重记忆窗口^①。

第一,以文化记忆理论来分析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文本。“文化记忆”是扬·阿斯曼在他的代表作《文化记忆》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是摆脱了日常并超越了个体间交流的记忆”^②。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被赋予了特定群体的共同属性。这些集体共有的文化记忆为所有成员提供了“都能接受并珍视的标志、价值和准则”,相关的人通过参观、瞻仰、庆祝、纪念等文化形式来重温这些记忆,“把当下与过去对接起来,借助过去照亮现在”,从而得以“确认并强化自己的身份”^③。中共通过纪念活动重复并强化了政治组织和人员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强调的是政党文化对于记忆活动的影响,是从政党文化的维度来探讨过去与当下的关联。以文化记忆理论观照中共纪念史研究,能够生成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尤其是可以“把那些在历史学家看来只具有史料意义的回忆材料转变为构成一种记忆史的构建本身,而不是只用这些回忆材料提供的东西来矫正历史”^④。正因如此,文化记忆及其社会功能成为近年来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焦点主题。文化记忆通常体现在一定的纪念文本中,而纪念文本则是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对纪念文本进行解读是目前中共纪念史研究者最为熟悉,运用得最为频繁,取得成果也最多的研究方法^⑤。在文化记忆的学术取向中,“文本”或“叙事”其后的社会情境比史料本身更能激发研究者的兴趣。

任何记忆都不是自发生成的,它是由“记忆政策努力和干预的结果”。对于政治记忆来说,它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浓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一个政党的政治记忆,是这个政党存续的重要基础,它既是其成员身份认同的要素,更是其性质和其所追求的目标的直接体现。记忆无法自动保存,它的传承要在“社会框架”的范畴内实现,“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⑥。中共纪念活动是构建保存记忆“社会框架”的有效途径,这种建构承载乃至超越了个体的群体记忆,通过纪念活动的开展,抽象的政治理念得以与具体的事件相关联,使得纪

^① 社会学研究者对记忆分析方法的总结,为中共纪念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们从分析路径和方法论的层面将记忆分析的方法概括为四类,分别是符号和文本分析、口述史和民族志分析、比较历史分析、定量分析。相关论述参见钱力成、张翩翩《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②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0页。

^③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第371页。

^④ [法]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亚《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顾杭、吕一民、高毅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51页。

^⑤ 较早和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志军《一九五一年:建党30周年“文本纪念”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魏建克《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七一”纪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⑥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念的意义得以广泛传播。然而,纪念活动的亲历和重演只是历史性的,它的存在只能通过文本记载而保留。因此,纪念文本是中共纪念活动史的存在方式,也是中共构建和保存中共群体记忆的主要途径。因此,通过对纪念文本包括符号、话语等进行分析,来解读纪念文本的语义结构和话语特征,挖掘其中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是研究中共纪念史的基本方法之一。研究者对中共如何借助纪念活动以及纪念文本等记忆形式来达到构建群体记忆的认知,也同样必须在纪念文本之中才能够实现。

第二,以记忆媒介为空间的研究,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新主题。记忆史框架下的中共纪念史研究,与以往研究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研究主题的差异。在记忆与纪念的关系中,记忆中有过去印象和回忆,或多或少可以在纪念仪式的操演中得以传播和保持。中共纪念活动是借由“纪念”这一象征方式来表达其政治诉求、保持其权力关系的政治仪式,它“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遭遇,重演过去之回归”,“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①。因此,中共纪念活动具有宣传政治主张、加强政治领导、保存历史意识、总结历史经验等记忆功能,而这些记忆功能不得不通过某种纪念媒介而保存下来,除了纪念文本之外,诸如会议、游行、会演、修建纪念设施等多种形式,都是中共记忆媒介的具体形态。中共在历史上,就曾强调过要通过各种纪念方式来强化政治记忆,例如,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纪念和宣传“切勿一般地抽象地进行”,要通过与当下中国革命的任务相联系的理论、策略和主义的宣传,来扩大和深化中共的政治影响。具体可以采取组织召集群众纪念大会,成立各种公开的学术组织,组织社会科学演讲会,组织募捐和出版纪念专刊、单行本、壁报等内容充实而又通俗易懂的形式来传播中共的政治影响^②。这些纪念方式,实际上承载的就是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忆。

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受实证传统的影响,研究者大多是通过爬梳资料来完成研究,一般很少用实物的材料来叙述历史,长期忽视语言和文本之外的例如文化遗址、博物馆、纪念碑、公共节日和纪念仪式等传承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的作用,这是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的一个短板,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纪念之中的记忆现象总是具体的,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记忆物质化。“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任何一个群体,如果它想作为群体稳定下来,都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一个为群成员间的各种交流提供场所的空间。”^③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记忆空间既是人们回忆的场域,也是人们身份和认同的象征。记忆与空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一种记忆术即记忆方式,而记忆方式谋求“把不可靠的自然记忆装载到一个可靠的人工记忆之中”,人们所依赖的记忆途径就是把空间作为记忆的媒介,通过特定的结构化的空间对记忆的内容进行“视觉联想”构成“建筑式的记忆隐喻”^④。实际上,书面文献只是记忆的文本性体现,而文本“只是传统得以继承的外部条件,而非其决定因素,因为文本一致性需要一个意义关联的空间。有了此种空间,不管怎样时过境迁,文本不仅存在,而且保持效力”^⑤。因此,空间场域在记忆构建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在一个历史性的场所感受到的印象,比起来那些通过道听途说和阅读得来的印象要‘更加生动和专注’”^⑥。然而,当前对这一类具有塑造政治记忆功能的“记忆之场”研究价值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实际上,“博物馆的收藏和陈列与史学著述,异曲同工,都是为了张扬民族意识,提升公民

①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27页。

③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第32页。

④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⑤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第373页。

⑥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第344页。

的民族认同,增加他们的民族情感”^①。综合分析现代国家政权如何利用书面文献和纪念场所诸如展览之类的新型空间形式来宣传革命历史,传播革命记忆,构建群体认同,塑造政治记忆,将有力地提升中共纪念史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准。

第三,合理地运用口述史的记忆史料来进行中共纪念史研究。历史与记忆既相互依托又彼此区别,历史强调的是研究主体对蕴藏在史料中的事实进行考察,而记忆即便通过口述而转化为文献性史料,也只是一块尚未得到研究主体分析的原始性材料,并且是一种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的材料。然而,支撑历史研究的许多史料,恰恰都是借助于记忆口述而留存下来的材料,这种记忆口述材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能。但是,口述史料只是记忆选择性和倾向性一种结果,因而,对这种史料的处理,就必须依据历史研究的规范性方法进行甄别和运用。

对于中共纪念史研究来说,口述记忆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是“具有一个观察被忽略了的和司空见惯了的的东西的崭新的视角”,“具有融合力的、跨学科的潜力”^②。新文化史研究兴起后,历史学的认识论发生巨大革新,“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朴素实证主义的文献学历史专注于以往忽视的问题”^③。在历史学的研究实践和理论学术形态更迭之际,“历史记忆仿佛在突然间绽放出从前所没有过的光彩”,在档案、报刊、小说、日记、图画等文本史料之外,口述记忆作为史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具备了合理性和可靠性。“民间史、大众史或口述史或公众史或者甚至于神话的,现在作为一种元史学范畴,将这一切都收揽进来。……记忆变成了新文化史中的主导词”^④。以改革开放纪念研究为例,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深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需求日益迫切。整理与收集4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口述记忆,是总结这场社会巨变历史经验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史料建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口述记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来源之一,中共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当下的多数人都未曾亲历,这就需要通过纪念活动来回溯、展示、讲述“过去”的事件,从而使人们从记忆中理解“过去”并保存“过去”。但是,口述记忆不可能自己构成历史,它需要经过历史研究的过程将其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记忆的责任来自每个历史学家自身”^⑤,历史学家应当不断完善处理口述记忆的“技艺”,合理有效地利用口述记忆来帮助人们理解“过去”。

在中共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纪念活动,都可以通过口述史学的方法,将留存于特定时期的口述史料转化为一种可行性的纪念史研究。口述史料本身就是一种作为社会行动和身体行为的记忆,因为口述的过程是个人记忆公共化的过程,是个人记忆向社会记忆、政治记忆转化的过程,因此,口述记忆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料是纪念史研究中记忆史料的重要来源,它借助承载记忆的文字,为纪念史研究提供了“唤回物体和事件”的线索,成为纪念史中“回忆最有力的稳定剂”^⑥。从记忆的功能或效果上看,经过口述史料表述过或者记载过的人物或事件,比从未经过上述过程的人物或者事件,更容易被人们所记忆。正因为口述记忆史料具有如此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共纪念史研究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史料进行研究。

当然,要想理解作为“历史记忆”的史料当中所蕴含的历史背景和意义,还需要研究者对史料进行甄别、理解、思考和再加工,才能得出具有学术价值的结论。研究者必须要“尽可能深入到其所研

① 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第84页。

②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③ 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学海》2015年第3期。

④ 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⑤ 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学海》2015年第3期。

⑥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第284页。

究的社会与文化田野中去”^①，“动用全部的智识资源、理论的视角、本体论传统、研究文献和其他别的资源，来考察资料”，才能“达至对研究的总体意涵既令人兴奋，又兼具有批判性的思考”，“如果处在智识的真空当中，或者，脱离了更为普遍和基础性的学科框架，那种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就是没有意义的”^②。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提出记忆的“田野”、文本的“田野”等隐喻性概念，它们在社会表征的意义上是类似的，都可以成为探究社会历史变迁真相的途径和方法。

传承历史记忆是史学的基本功能，这同样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或者目的之一。历史无法被尽善尽美地还原，因为价值选择总是左右着历史记忆的建构和后人的研究取向，“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与失忆之间很可能会呈现不同的图景”，“对历史研究而言，只有先获得真实全面的历史记忆，才能实现史学其他方面的功能”^③。理论建构与研究实践是在互动中不断向前推进的，中共纪念史研究需要积极借鉴或移用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拓展研究思路和增强问题意识，“引进新方法其实不一定非落实在成体系的‘理论’之上不可；很多时候，只要换个新的视角，就会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历史上的人与事本来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视角的转换在许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层面，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许多早已重视的层面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立体性’或‘全息性’认知”^④。中共党史研究者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理论和方法来开展学术实践，不断创造中共党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文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 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 止耳)

《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11 期要目

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历史的论述及启示

邱巍

寻觅“他者”镜像下的中共革命史

李金铮

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旧与新

李里峰

“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收集与利用: 点滴体会

应星

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心灵史

黄道炫

“新革命史”语境下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路径

唐小兵

从文件到文本: 试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多维史料观

吴起民

由“社”入“会”: 浙江中共组织嵌入与革命动员的演进(1925—1934)

王才友

列强对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的因应

周斌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过程研究

徐显芬

走向和平共处: 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

梁志

“红色史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

李孝迁

美国国务院 RG 59 类非核心档案及其有关中国的材料简介

姚百慧

① [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董薇译，周大鸣校，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6页。

② [英]大卫·希尔弗曼《如何做质性研究》，李雪、张劭颖译，卢晖临校，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③ 孙俊《价值选择影响历史记忆的构建》，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人民日报理论著述年编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75页。

④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